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十九)

Occasional Paper No.19

# 越南青梅社鐘與貞元時期 的安南研究

A STUDY ON THE VIETNAMESE  
THANH MAI BELL AND AN-NAM IN  
THE ZHENYUAN PERIOD

耿慧玲 著

By Keng Hui-Ling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十九)

Occasional Paper No.19

# 越南青梅社鐘與貞元時期 的安南研究

A STUDY ON THE VIETNAMESE  
THANH MAI BELL AND AN-NAM IN  
THE ZHENYUAN PERIOD

耿慧玲 著

By Keng Hui-Ling



香港大學  
饒宗頤學術館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學術論文/報告系列  
編輯委員會

顧問：饒宗頤教授、李焯芬教授

主編：鄭焯明博士

執行編輯：龔敏博士

助理編輯：羅慧小姐(兼秘書)、陳德好小姐、余穎欣小姐

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HKU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Editorial Committee

Advisors : Professor Jao Tsung I, Professor C F Lee

Chief Editor : Dr Cheng Wai Ming, Peter

Executive Editor : Dr Kung Man

Assistant Editors : Miss Luo Hui (Secretary) , Miss Chan Tak Hou,  
Miss Yue Wing Yan

## 內文提要

本文利用越南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一枚銅鐘，也是唯一一枚唐代的銅鐘—青梅社鐘記載的內容，作為八世紀末九世紀初北部越南的歷史研究。

鐘銘記載了二百四十八名人物，三十二種姓氏，根據鐘銘姓氏的分佈及其勢力分析，可以映證地方豪族在越南所具有的影響力，尤其在唐代歷史上頻繁出現以杜氏為首的地區衝突，與鐘銘的記載基本上相合。

女性在鐘銘中出現的比例，顯示女性在此時期所擁有的經濟力量與參與「社」的積極性，與中原地區有相當的差距，也是值得重視的社會現象。

鐘銘中出現的衛府資料是天寶之後，衛府如何運作的重要資訊。鐘銘中大量出現的關內道與河東道的衛府官職，說明天寶之後，府兵制度在已經崩壞，無軍士、戎器、糗糧的狀況下，中央如何利用尚存之府兵兵額，授與安南地區地方豪族，以填補中央衛所不足之兵源，並配合實際的需要，作為整合地方軍事力量，穩定區域性動亂的重要手段。

青梅社鐘的內容既可以呈現古代越南的歷史，也是中國唐史的一部分；既是安南這個地區的社會現象，也是唐代整個國家社會現象的一環；而金石自然取樣的功能，更可以讓我們可以從「他者的眼光」檢視越南的社會，反窺中國的歷史發展。

## Abstract

The inscription on the earliest known piece of Tang-Dynasty bronzeware, the *Thanh Mai Bell* (*la cloche de Thanh Mai*), contains valuable information regarding of 8th-9th Century Northern Vietnamese history.

The *Bell* inscription includes the names of 248 donors across 32 surnames.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surnames and an analysis to their possible correlations of regional clans, the *Bell* inscription is presented as a piece of evidence that could relate to historical account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concerning the *Du* clan and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 of control.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names included in the *Bell* inscription suggests that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had become significant at the time, which is clearly distinct from the inland province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active role of women in society is a social phenomenon tha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e *Bell* inscription also provides crit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hange and function of the *fubing* system after the Tianbao Era. The fact that Vietnamese individuals were able to receive many core provincial *fubing* appointments suggest that the *fubing* system was defunct in Tang China, for the Tang government was using these under-drafted and unstaffed *fubing* appointments to integrate local clans and their conscript forces and to quell regional dissent.

While the content of the *Bell* inscription is a vivid specification of its Vietnamese context, it also provides a *tertium quid*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ang Dynasty history in the Zhenyuan Era, exhibiting intricat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ymmetrie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 目 錄

|     |                       |    |
|-----|-----------------------|----|
| 第一節 | 序言.....               | 4  |
| 第二節 | 唐貞元安南〈青梅社鐘〉銘文再釋.....  | 9  |
| 第三節 | 青梅社鐘內容的分析.....        | 22 |
| 第四節 | 青梅社鐘與唐代的府兵.....       | 37 |
| 第五節 | 結論—青梅社鐘對於唐史研究的啟發..... | 48 |

## 第一節 序言

1994年筆者自美國柏克萊大學結束東亞圖書館的中國拓片整理工作返臺，法國遠東學院的傅飛嵐教授（遠東學院駐臺代表）即邀請筆者加入法國、越南合作的漢文拓片整理計畫。當時擔任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毛漢光先生接受王秀惠大使夫人（遠東學院駐臺副代表）的建議，將原本是筆者個人的參與計畫，升高成為三個機關的合作計畫。當年10月中正大學文學院與法國遠東學院即簽訂一個學術合作條約，開始執行越南漢喃銘文的匯編及出版計畫，這個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有系統地將越南漢文拓片整理出版。<sup>1</sup>

越南漢喃研究院是越南從事古代漢文化研究最重要

---

<sup>1</sup> 有關計畫整個擬定籌畫的過程，請參考耿慧玲等編撰：〈序〉，《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北屬時期至李朝》（後文簡稱《匯編》）（河內漢喃研究院、巴黎遠東學院合編，1998年），頁X VII至X X VIII。

的單位。<sup>2</sup>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時，越南尚處於法國殖民時期，法國遠東學院在越南全國對石刻與鐘銘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搨拓工作，結果共採集了石碑、銅鐘一萬零三百六十件，搨拓二萬五千張拓片。<sup>3</sup> 這批資料在法國結束殖民統治撤離越南後移交給了漢喃院，這便是漢喃銘文計畫的主要整理與出版的元素。<sup>4</sup> 然而一萬多件碑銘，是一個相當大的數量，究竟要用怎樣的方法，才能夠有效率地將這批資料快速地整理出版，讓學者們能夠方便使用？那便絕對不能是根據拓片編號的順序，因為拓片的編號只是一個搨拓時的流水號，即便是有地區的分類，卻最無法顯現拓片內容所蘊含的珍貴性質。

<sup>2</sup> 漢喃研究院是越南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的下屬單位，越南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為越南政府所屬智庫之一，主要工作是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門，並為政府提供相關政策研究。該院由原本的十七個研究所與七個研究中心，已重新統整且更動為二十四個研究所，其中有四個單位與中國研究有關，即文學院（INSTITUTE OF LITERATURE）、歷史院（INSTITUTE OF HISTORY）、中國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及漢喃研究院（INSTITUTE OF HAN NOM STUDIES）。其中漢喃院基本上承繼了法國遠東學院在殖民時期所收藏的早期漢文越南史料，而成為研究古代越南與中國關係最重要的單位。至於中國研究中心則主要負責當代中國的歷史文化與經濟、政治、社會等問題之研究，並提供政府單位政策擬定之參考。歷史院與文學院因為研究古代越南歷史與文學而主要從事古代漢文及中國歷史有關之研究，因而漢喃研究院成為一個集古代漢文資料與研究人員的重要學術單位。

<sup>3</sup> 因為一些石碑有陰與側，銅鐘有數面，故拓片總數較多。

<sup>4</sup> 除了第一次法國地毯式的蒐集與搨拓外，從1958年到計畫執行前又新摩拓片約四千餘張，可是多半與前述搨拓的內容重覆。從1983年到1986年，河內文化所對河內市內和郊外之四郡四縣所有石刻、鐘銘也進行搨拓工作。此外，一些文化機關和研究機關也存有零星的銘文拓片。因此，就數量與質量來看，越南漢喃研究院所收藏的拓片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在計畫執行中，也蒐集了新搨拓的碑誌與鐘銘，因而總數較原先統計的要來的多。

筆者與毛老師商量的結果，建議依據拓片內容的時代順序作為整理出版的次序。經與漢喃研究院及遠東學院商議，決定採取這樣的方式整理與出版。我們將碑銘分成三個大的段落：

一、銘刻初期：從七世紀到十四世紀。

二、石刻銘文發展時期：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

三、銘文廣泛深入發展時期：十九世紀以後。

在原先的估計中，第一個時期大約有七十七枚碑誌與鐘銘；第二時期有五千八百七十七枚碑誌與鐘銘；第三時期則約有四千零二十枚碑誌與鐘銘。計畫出版七集，每一集相應於一個歷史階段：

第一集：自北屬至李朝

第二集：陳朝

第三集：黎朝初期

第四集：莫朝

第五集：黎朝中興期

第六集：西山朝

第七集：阮朝

其中第一集與中國的歷史關係最為密切，因為其牽涉到的範圍是越南直接隸屬於中國的時期，及逐漸脫離中國中央統治，開始獨立發展政治體制的時期。在《越南漢喃銘文匯編第一集——北屬至李朝》一共收錄了二十七篇的碑誌與鐘銘，其中有四篇是越南直接隸屬於中國當時的政權版圖之中，分別是隋煬帝大業十四年

(618) 的〈大隋九真郡寶安道場碑文〉、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的〈青梅社鐘銘〉、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的〈天威徑新鑿海派碑〉及南漢中宗乾和六年(948)的〈日早古鐘銘〉。本論文所討論的〈青梅社鐘〉正是這一個時期的鐘銘。

〈青梅社鐘〉是越南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一枚銅鐘，也是唯一一枚唐代的銅鐘，更是現存在越南的唯一一件唐代銘刻文物。<sup>5</sup> 而其鐫刻的一千五百四十二字所展現出的內容更是瞭解貞元時期唐代歷史重要的資料。在1996年11月24日第三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議上，筆者與中正大學廖幼華、王德權兩位副教授曾共同發表一篇〈唐貞元安南《青梅社鐘》銘文考釋〉，當時純係計畫初始試作的一篇論文，希望結合不同領域的中古史學者，共同探討越南碑誌作為中國歷史研究的可能性；同時因為計畫正執行中，資料不宜事先公開，故其欲介紹越南碑誌的意圖較重，研究的內容則較為粗疏。待計畫進行至第一集出版之時，又因為計畫執行單位之間的聯絡不便，進度差異，及出版的主導性不在中正大學，使得體例及內容與第二集有些落差，筆者一直引以為憾，希望能夠將已出版的第一集碑銘做進一步的校證，尤其是四篇與中國有直接關係的銘文。本文之作只

<sup>5</sup>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的〈天威徑新鑿海派碑〉實物已佚，今碑文收錄於〔越〕黎崱撰，武尚清點校《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32-235頁；又據李慶新先生提供資訊：越南目前尚有出土與蒐集唐代陶瓷銘刻，不過以陶瓷刻銘之常例，銘刻內容可能不若銅鐘有完整之「記述型」資料，有關這一方面之資料尚待調查。

是重新校證的第一步，希望重新檢視原有的一些校釋，釐清一些原有的錯誤，並重新設定格式，讓學者能夠更清楚地瞭解鐘銘原來的狀態，以便於進一步的利用。同時對鐘銘中所展現出的一些歷史現象作一些提引，希望能夠激起更多的討論。

## 第二節 唐貞元安南〈青梅社鐘〉銘文再釋

維貞元十四年歲次戊寅三月辛巳朔卅日<sup>6</sup>庚<sup>7</sup>，隨喜社伍十三人共造鴻鐘壹口，用銅九十斤<sup>8</sup>，流通供養<sup>9</sup>。

社主、將仕郎、前守思陵州安樂縣<sup>8</sup>尉杜仙夔<sup>四</sup>。

副、散將守左金吾衛儀州青谷府<sup>9</sup>別將黃太極<sup>五</sup>；

副、守<sup>四</sup>州安樂府<sup>10</sup>折衝都尉郭子剛<sup>11</sup>。

<sup>6</sup> 下標中文數字代表行次。

<sup>7</sup> 碑文「貞元十四年（798）歲次戊寅三月辛巳朔」字跡清楚，然而日與干支因處第一行末較為模糊，唯見第二行地支為戊，按三月辛巳朔，地支為戊者為六日丙戌、十八日戊戌、卅日庚戌，此處應為卅日庚戌。

<sup>8</sup> 《新唐書》有「思陵州」之記載，但無轄縣記錄，據本鐘銘可補安樂縣。參見〔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中華書局本影印標點本，1981年），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嶺南道·安南都護府〉，第1145頁。

<sup>9</sup> 《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三〉：「遼州樂平郡，下。……先天元年避玄宗名曰儀州。……原注：『有府三，曰遼城、清谷、龍城。』」（〔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1005頁。）按：「清谷」鐘銘作「青谷」。

<sup>10</sup> 據「社孔目王茂徒」條，安樂府屬沁州；又《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三〉：「沁州陽城郡，下。本義甯郡……有府二，曰延雙、安樂。沁源，中。」（〔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1004-1005頁。）

<sup>11</sup> 「剛」：《匯編》原作俗字，逕改，以下同。

社眾、尊侍<sup>12</sup>老 王辯<sup>13</sup> 真；

前攝長州文陽縣<sup>14</sup> 令杜仙寧<sup>15</sup>；

判官、守文州陰平府<sup>15</sup> 別將賞緋魚袋杜備；

社錄<sup>16</sup>事、杜遊秦；

沁州安樂府折衝郭遊理；

將仕郎<sup>16</sup>、前守為州漢會縣<sup>16</sup> 尉黃漢忽；

上柱國李天幸<sup>16</sup>；

<sup>12</sup> 「侍老」是唐代敬老政策下，對於老年人的賜銜。有關唐代「侍老」的研究狀況可以參考劉興雲〈淺議唐代的鄉村養老〉：「關於唐代養老問題，學界已取得豐碩成果，如陳明光的〈唐代的侍老制度〉（《文史知識》1991年第11期），張國剛的〈關於唐朝的老人問題〉（《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8日），王先進的〈唐代的家庭養老〉（《固原師專學報》2006年第1期），牛致平和姚二團的〈唐代的敬老風尚〉（《瓊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以及盛會蓮的博士學位論文〈唐五代社會救助研究〉中的唐五代時期政府與民間救助問題的相關論述等，這些研究都為我們對相關問題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劉興雲：〈淺議唐代的鄉村養老〉，《史學月刊》2007年第8期，第120-123頁。）又，本鐘銘題記稱「尊侍老」，不知是否即「侍老」中之長者。

<sup>13</sup> 「辯」：《匯編》原釋作「管」，據碑文為「辯」字俗寫。

<sup>14</sup> 「文陽縣」，《新唐書·地理志》作「文楊郡」。《新唐書》卷四十三上〈地理志七上·嶺南道〉：「長州文楊郡，下。唐置。土貢：金。戶六百四十八。縣四。文陽，銅蔡，長山，其常。」（〔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1114頁。）

<sup>15</sup> 「陰平」：碑文原作「蔭平」，據鐘銘後文及《新唐書·地理志》改。《新唐書》卷四十〈地理志四·山南道〉：「文州陰平郡，下。義寧二年（618）析武都郡之曲水、正西、長松置。」（〔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1036頁。）

<sup>16</sup> 《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嶺南道〉載嶺南道安南都護府有為州，屬縣三：「都龍，漢會，武零。」（〔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1145頁。）

守左驍衛綏州萬吉府<sup>17</sup> 別將吳進仕；  
社評政<sup>十一</sup>、黃智待；  
鹽州鹽川府<sup>18</sup> 折衝高操；  
貴州龍山<sup>十二</sup>府<sup>19</sup> 別將杜朝良；  
綏州萬吉府別將李天陽<sup>十三</sup>；  
守左驍尉綏州萬吉府別將黃太備<sup>十四</sup>；<sup>20</sup>  
沁州安樂府果毅陳期；  
社錄事、左果毅、上護軍呂<sup>四</sup>；  
[右]可倍戎校尉、守 [左]威文州陰平府折衝楊  
質；

<sup>17</sup> 《新唐書》卷三十七〈地理一·關內道〉：「綏州上郡，下。本雕陰郡地。……原注：『有府四，曰伏洛、義合、萬古、大斌。』」（〔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974頁）；按谷霽光〈唐折衝府考校補〉（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編委會：《隋唐五代史補編》第三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427-444頁），「萬古府」條疑《新志》「萬古府」或為《隋書·地理志》「吉萬府」之誤（谷霽光：〈唐折衝府考校補〉，第432頁）。周曉薇〈唐折衝府考校補拾遺三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6卷第3輯，2001年9月，第61-66頁），第64頁引《隋代墓誌銘彙編》陝西卷第四冊載，西安市文管所藏天寶十三載（754）《馮思順墓誌》記志主「天寶三載（744）又轉授上郡萬吉府果毅」，證「萬古府」應為「萬吉府」，今本鐘銘亦作「萬吉府」，確證為「萬吉府」。

<sup>18</sup> 《新唐書》卷三十七〈地理一·關內道〉：「鹽州五原郡，下都督府。本鹽川郡。……縣二。原注：『有府一，曰鹽川。有保塞軍，貞元十九年（803）置。』」（〔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973頁。）

<sup>19</sup> 《新唐書》卷四十三上〈地理七上·嶺南道〉：「貴州懷澤郡，下。本南定州鬱林郡……原注云：『有府一，曰龍山。』」（〔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1103頁。）

<sup>20</sup> 以上第一面上；十三、十四行位於鉦篆間。

同經略衙前二十將<sup>21</sup> 阮齊穆；

容山府<sup>22</sup> 別將、上護軍杜軍三；

貴州龍山府別將郭先竭；

社支遣、杜太明<sup>四</sup>；

守左<sup>23</sup> 文州陰平府別將阮容；

守左<sup>24</sup> 朔州尚德府<sup>25</sup> 折五衝阮寧；

州萬吉府別將杜賢；

四品子、上柱國<sup>六</sup>杜幹俊；

<sup>21</sup> 「十將」又作「什將」，位於兵馬使之下，職任在整訓軍隊。什將的命名有三種：以兵種分、以序號或任務稱。見張國剛：〈唐代藩鎮軍將職級考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67頁。

<sup>22</sup> 據張沛《唐折衝府匯考》：「《舊唐書·地理志》：嶺南道有容州，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銅州。『貞觀元年改為容州，以容山為名。』……容山即今廣西北流縣西北大容山。容山府疑以容山為名，在今廣西北流縣境。」見張沛編著：《唐折衝府匯考》（西安市：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67頁。

<sup>23</sup> 按：文州在本拓片中五出，此處僅作「左文州」，然第二面行十四作「左威衛」，文州陰平府應屬左威衛。

<sup>24</sup> 按：朔州尚德府，據第二面行八、九應屬左衛，又陸心源編《唐文續拾》卷六「李仲文」〈唐義昌軍故衙前將守左衛朔州尚德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賜上騎都尉劉府君墓誌銘〉，則大中年間尚德府屬左衛朔州。見〔清〕陸心源編：《唐文續拾》第五冊，收於《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頁。

<sup>25</sup> 按：新舊《唐書·地理志》朔州未載有尚德府，唯《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一〈王方翼列傳〉：「王方翼……坐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4134頁）；又大中年間劉士弘墓誌銘記載其為「守左衛朔州尚德府別將」，見〔清〕陸心源編：《唐文續拾》卷六〈李仲文·唐義昌軍故衙前將守左衛朔州尚德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賜上騎都尉劉府君墓誌銘〉，第25頁。

守涇州四門府<sup>26</sup> 折衝、賞緋魚袋郭立七；

上柱國杜如泰；

守左衛朔州尚德府別將郭鼎八；

守左衛朔州尚德府果毅郭昭；

守左驍衛綏州大九斌府<sup>27</sup> 別將楊鳳鵠；

社孔目、高鼎；

將仕郎、試柳十州<sup>28</sup> 同戶參軍高英文；

上護軍郭哥；

石州離石十一府<sup>29</sup> 別將黃泳；

綏州萬吉府別將黃藉；

上柱國十二阮廷裕；

石州離石府別將杜騫<sup>30</sup>；

別將高國口十三；

<sup>26</sup> 《新唐書》卷三十七〈地理志一·關內道·關內採訪使〉：「涇州保定郡，上。本安定郡，至德元載更名。……原注：『有府六，曰涇陽、四門、興教、純德、肅清、仁賢。』」（〔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968頁）；又，涇州四門府屬左武衛，見毛漢光：〈唐代軍衛與軍府之關係〉，《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第五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三年（1994），第139頁。

<sup>27</sup> 《新唐書》卷三十七〈地理一·關內道〉：「綏州上郡，下。本雕陰郡地。……原注：『有府四，曰伏洛、義合、萬古、大斌。』」（〔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974頁。）

<sup>28</sup> 《新唐書》卷四十三上〈地理志七上·嶺南道〉：「柳州龍城郡，下。本昆州，武德四年（621）以始安郡之馬平置，是年，更名南昆州，貞觀八年（634）又以地當柳星更名。土貢：銀、蚺蛇膽。戶二千二百三十二，口萬一千五百五十。縣五。」（〔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1107頁。）

<sup>29</sup> 《新唐書》卷三十九〈地理志三·河東道〉：「石州昌化郡，下。本離石郡，天寶元年（742）更名。……原注：『有府二，曰離石、昌化。』」（〔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1006頁。）

<sup>30</sup> 「騫」：《匯編》原未釋出。

兵曹參軍□□□；  
守左威衛文州陰平府別將□□<sup>十四</sup>；  
慈州吉昌府<sup>31</sup>別將黃龍□；  
石州離石府別將□□<sup>十五</sup>；<sup>32</sup>  
上護軍阮□□；  
守左衛朔州尚德府果毅杜□□-；  
守左金吾衛沁州安樂府果毅王茂徒；  
□□寺住持=僧法賢；  
上護軍王益；  
文州陰平府果毅武□□<sup>三</sup>；  
守左衛<sup>33</sup>沁州安樂府果毅杜承位；  
故□□□□□<sup>四</sup>；  
故郭廷秋；  
故杜仙堂；

<sup>31</sup> 《新唐書》卷三十九〈地理志三·河東道〉：「慈州文城郡，下。本汾州，……原注：『有府三，曰作城、吉昌、平昌。』」（〔宋〕歐陽修、宋祁等編纂：《新唐書》，第1002頁。）

<sup>32</sup> 以上第二面上；十四、五行位於鉦篆間。

<sup>33</sup> 按：《唐折衝府匯考》，新補〈唐慕容妻武氏墓誌〉與〈唐何德墓誌〉，沁州安樂府屬右金吾衛。（張沛：《唐折衝府匯考》，第178頁。）然本面沁州安樂府一作「左金吾衛」（行二），此處作「左衛」，據理，多字可省作少字，少字鮮可能作多，如「松山村」可能誤減為「松村」，然如本為「松村」要誤刻作「松山村」的可能性較少；且與本拓片書法比較，應作「左」而非「右」。不知何者為是。